



# 文化强澳，文化强国

□吴志良

“一国两制”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保持澳门和香港两个特区长期稳定繁荣的最佳安排，更是中国传统智慧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贡献。“一国两制”本身，是人类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模式的伟大创举，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新形态。“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以实际行动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回顾澳门的发展历程，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都与文化以及我们对历史文化的态度息息相关，都以文化作为稳定器和深层基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守护传承中华文化，创造性地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的突出特性，是澳门在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的看家宝，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澳门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我们最大最宝贵的财富。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大湾区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都说，“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毫无疑问，澳门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最有价值、最能贡献力量的也是文化。以文化强澳并以文化强澳参与文化强国，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的中心任务。

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随着经济和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不可避免会遇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困难和挑战。其中一个重大挑战，就是西方世界对中国价值、中国理念和中国发展的不了解、不理解甚至故意误读、曲解、抹黑、围堵。如何将中华文化鲜明特性和价值追求延展至世界维度，实现中外话语体系在价值观念上的开创性对接，港澳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也可以利用特殊的地位，发挥特殊的作用。事实上，港澳对外文化交流的独有话语体系，也建立了广泛的对外联系网络。

这是港澳的特殊优势，也是国家赋予港澳特区的光荣使命。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港澳分别定位为中外文艺交流中心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交流合作的基地。澳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曾经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也在国际上享有公认的地位，我们有条件、有愿意、有经验、有能力也有网络去肩负国家赋予的光荣使命，全力以赴传承发展文化，促进国际人文交流，将澳门打造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讲好澳门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作者系澳门文化界联合会会长。本文系作者在“澳门文化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华文明5000年绵延不断，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在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令世人惊叹不已。这必定有一种精神的力量，有其思想的源泉。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更需要这种长盛不衰的精神力量的鼓舞，更需要从源远流长的传统思想中寻找智慧。也只有回归传统，回归文化，才能坚定我们的信念和信心，才能适应世局的风云变幻，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特性，是中华民族历史兴衰和艰苦磨难探索出来的，必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因和密码。他早在2013年就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澳门是中华文化近代发展的一个缩影，也精彩演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性。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港口城市，澳门向来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忠诚继承者和坚定守护者，又是中国最早最持久与西方文化交往交锋交流的前沿阵地。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信仰在澳门共生共荣，形成了中西并举、古今同在、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城市特性，塑造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城市精神，不仅创造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构筑了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桥梁，还成为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兼容并蓄的典范。

澳门回归祖国后，实行“一国两制”，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一

# 献身文学的人

——怀念华文作家林佩芬

□阎纯德

2023年6月16日，作家林佩芬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了，我极其痛苦，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我结识林佩芬女士是20世纪末，我们相识于“林佩芬作品研讨会”，之后她于2003年由台北移居北京。

林佩芬喜欢狗，由台湾迁来时带了七只，后来她的狗越养越多，最多时竟有十六七只。邻居们都知道她喜欢狗，常有人将刚生下的小狗送到她家门前，善良的林佩芬便将它们收下喂养。2006年春，她来我家，一进门就高兴地说：“阎先生，给你送来一个宝贝！”我女儿向前迎接，一看是一只才生下三天、连眼睛还没睁开的小狗。这就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安家落户、由我家养了十余年的大名鼎鼎的“prince”（王子）。以狗为媒，我们成了“亲家”。之后，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她抱着爱犬到我家，从来都是我称我“亲家公”。

我们无数次的交往，无论是与古继堂先生还是与关纪新先生，谈论的不是她的作品，就是有关台湾作家。在北京语言大学，我们总在“零点食堂”的餐桌上谈天说地，她时常安静得像沉默的山，平时喜欢缄默的我，在作家面前话反而多起来。我们的聊天总是以“文学”为中心，我偶尔也会说起对两岸和平统一的愿望，这时她也会接我的话茬：“我们这代中国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和对历史的责任与使命。统一这件大事是大势所趋，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谁也阻挡不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2022年冬，她发给我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题为《17世纪以来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以沈光文、陈永华、连横为考察中心》。她在电话里说：“亲家公，我们见面很少谈及‘台湾’，您看了我这篇文章就懂我了！”林佩芬在文章里说：“如果寻根溯源，全方位考察台湾的历史与文化，便可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万历年以来，日本‘倭寇’乱事，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则因谋求发展而东来，致使台湾长期陷入黑暗；直到1652年，沈光文大力推动中华文化教育，在台湾文化教育史上被誉为‘开台先师’。其后，陈永华推广文教、兴建孔庙、弘扬儒学，清代二百多年，是台湾历史上文风昌盛的时期；及至清末，连横集大成，不但诗赋文章可观，并撰《台湾通史》一书，使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繁荣昌盛。”这就是她的台湾观。

林佩芬1956年4月12日生于台湾基隆。中学时代就喜欢文学的她，从1978年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首部中篇小说《一九七八年春》，之后又陆续出版了《声声慢》《洞仙歌》《大江东去》《月明千里》《燕双飞》《第四乐章》《雁字回时》《都市丛林股票族》《台北风情》《城市英雄》《唱一首无言的歌》《台北·京都·哈尔滨》等作品，她的作品较早展现了身在台湾的“外省人”的后代意识及对“家国问题”的历史性思考。

林佩芬从少年时代起，耳濡目染于父辈怀乡思土的悲怆乡愁，由此，家世传承、历史行进和时代更迭勾起她无限遐想。其父早逝，少有父爱的她，“恋父情结”成为她创作的初衷和动力。台湾东吴大学毕业后，她开始尝试历史小说创作，第一部《努尔哈赤》就是献给已在天堂的父亲。谈起往事，她笑着说自当初不知天高地厚，真要提笔写作时，才发现自己的欠缺。于是，学中文，学满文，啃历史，不仅阅读、查证无数古今书籍资料，还几次赴东北清代史迹保留地实地踏勘、体验。她把自己关在斗室潜心创作，日复一日地在稿纸上述说兴亡，常常“息交绝游”，含辛茹苦18载，《努尔哈赤》才从不毛之地屹立起一座大楼。林佩芬曾说：“我写这部小说时还是个‘小女生’，没有想到会在文学写作中闯下一片江湖。《努尔哈赤》的内容和我的精神世界，都在随着岁月的脚步而改变。人家都不相信我会完成这部小说，于是，我便呕心沥血、日夜加工，终于完成了这部120万字的小小说。有人说这部描述清太祖波澜壮阔一生的小说，无论是大时代风起云涌的变局，或是历史人物细致的心情起伏，都显示了大手笔，达到了人文境界的高度。”这就是中国文学江湖中以写“历史”为己任的林佩芬。这个评价，对林佩芬来说当之无愧。她的作品中，许多热血沸腾的历史人物活生生地重现人间，在文学舞台上驰骋奔走。

林佩芬传奇、多产，辛勤耕耘一生。自20世纪90年代，她的历史小说先后在海峡两岸出版了《台北风情》《飞越婚姻线》《努尔哈赤》《辽宫春秋》《春天远去之后》《繁花过眼》《西迁之歌》《天问》《洞仙歌》《两朝天子》《故梦》等50余部，这些小说使她成为海峡两岸文学天空的一颗无法忽略的明星。

她的小说《故梦》系据此前的历史小说改写而成的



林佩芬

“大清开国”三部曲，小说是以林佩芬的家世为原型的一部“家国大戏”，以八旗贵族遗民陆氏家族近一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来述说中华民族百年的变迁史。在《故梦》的创作过程中，林佩芬并非抱着复原史实的态度进行书写，而是将大历史与小人物融合，在“宏观历史”背景下探究“微观人性”。有人评论这部作品说：“善于表现历史事件中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纵横开阔的历史写作和细致入微的人物塑造是林佩芬的创作特质。”她总是“以生动而凝重的文学语言来诠释和检讨历史嬗变”。关纪新在评论中说：“她差不多是在用一种历史学家的标准，鞭策着自我的知识积累和理性修养。”林佩芬自己说：“历史以‘人’为中心，组成历史的是人，对人性的探讨、研究、剖析，以人性印证史实，是历史学的重要课题，也是历史写作的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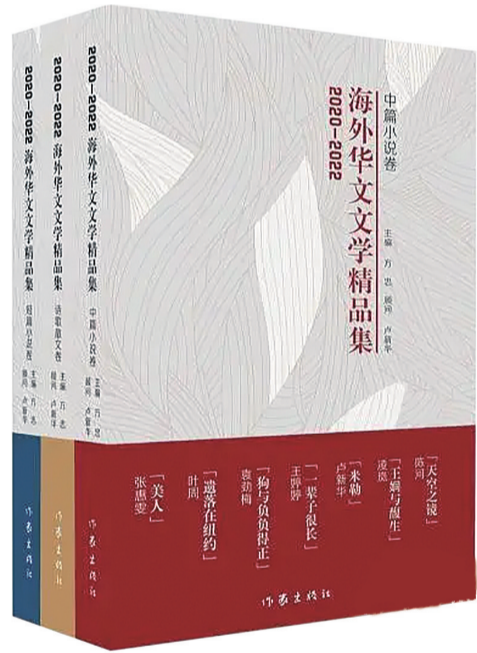
《故梦》80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林佩芬亲自担任编剧的40集同名电视剧，于2009年11月在北京卫视首播，获得了良好口碑。

现在她走了，海峡两岸文学界的友人和读者会永远记着她。她曾说要在北京办一个“文苑雅聚”，让它成为两岸文学界的交流平台。尽管林佩芬已经走了，但在中华文化的照耀下，海峡两岸定会“雅聚”在一起。（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 开辟新移民华文文学的新疆域

——评《2020-2022海外华文文学精品集·中篇小说卷》

□吴道毅 吴行健



《2020-2022海外华文文学精品集·中篇小说卷》，方忠主编，作家出版社，2023年3月

们的临终关怀，同时书写不同代际女性之间的特殊感情，明显可以看出“姐妹情谊”等女性主义理论对作品的影响。小说中，王娟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三代华人女性，二婚丈夫迪克是房地产开发商，夫妻在纽约过着富人的生活。魏生跟着丈夫老赵从南京来到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于纽约大学商学院毕业，就职于纽约百老汇附近的一家公司，并因为爱好读书，在书店的读书会上与公司行政大秘王娟结为好友。虽然王娟与魏生的母亲同岁，但整整一代人的年龄差距并没有阻碍她们成为“闺蜜”或好友，乃至相互之间产生别样的情愫。岁月流逝，时光流转，当只身生活、87岁的王娟因失去独立生活能力被两个儿子送进养老院时，魏生不惜从美国中部哥伦布市的家中赶往美东，将王娟从养老院偷偷送回王娟家中加以悉心照料。王娟的生命也许很快就会在大雪天走向终点，但因为有了魏生来到身边照料，她并不感到孤独，还领会到不同于家庭亲情的别样人生情谊。

旅美作家卢新华的《米勒》是一部集宗教、离散、人性、亲情与死亡等主题于一体的作品，思想厚重而有力，也延续着卢新华作为伤痕作家一贯表现的主题，并洋溢着浓厚的人道情怀与自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品主人公米勒是一位佛教徒，也是有着中国血统的柬埔寨人，漂泊欧美各地大半生，晚年在美国洛杉矶靠摆摊做小生意为生，最终见到了失散几十年的妹妹图图。但图图并不是他的亲妹妹，是他少年时在柬埔寨搭救的病中孤女。为了报恩，长大后的图图执意要嫁给当时还叫“无漏”的哥哥，遭到拒绝。伤心、失望之余，图图接受来自中国的一位革命青年的追求，怀上了对方的骨肉。这位革命青年的意外死亡被判为“无漏”，“无漏”由此踏上逃亡与漂泊之路，作品表现了宗教文化与人性或爱情之间的强烈冲突，更是热情有加地赞美了米勒身上的人性光辉以及他与图图之间感人至深的亲情，米勒简朴、乐观的生活态度、乐于仗义疏财、对妹妹的半生牵挂及对友情的珍重，等等，无不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也令人想到佛教中笑口常开的弥勒佛——米勒的读音甚至与弥勒颇有相近之处。作品中的图图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动人女性形象。

加拿大华裔女作家王婷婷的《一辈子很长》作为女性书写，通过洞烛灰色婚恋人生拓展了女性书写的疆域，表现出都市高学历人群为主体，聚焦新世纪都市市民生活常态的另类婚恋生活，及时捕捉到经济发展与文化开放语境下国人婚恋伦理观念的裂变。作品中的乔嘉行和肖筱，都是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学历人才——一个在航天单位工作，一个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任教。由于婚姻基础的牢靠、家庭地位的悬殊、配偶双方个性或价值观念的差异，以及自身的以貌取人或阅历不深、上当受骗，等等，他们竟然都不自觉地陷入形式婚姻的怪圈，或充当形式上的丈夫，或只是名义上的妻子，不约而同地感受着“一辈子很长，没有爱则度日如年”的苦闷与无奈。令人欣慰的是，乔嘉行和肖筱都努力挣脱了“婚姻”的枷锁，开始迎接新生活的曙光。

美国华文女作家袁勃的《狗与负负得正》以新冠

疫情和处在美国中部沙漠地带的豪县为背景，是一部书写现实与拷问人性并具有某种黑色幽默意味的作品。作品题名看上去有些怪诞，实际却对应着旨在改造美国监狱犯人的“重建工程”，并如一面多棱镜，折射着美国现实生活中犯罪率高、监狱暴力严重等诸多矛盾，彰显着人性的怪异及修复的可能。鉴于美国监狱无法改造犯人及野狗咬人的现实，H大学伦理学教授何正求与犯罪心理学教授查理提出一个名为“犯人+野狗”的“重建工程”，具体做法有“让刑满释放的犯人表现好的犯人当‘狗教官’”等。伴随着这一工程的推进，方方面面的问题逐渐暴露无遗。

在“9·11事件”过去20周年之际，美国华文作家叶周推出《遗落在纽约》，表现出深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品的一个独特与可贵之处，是把“9·11事件”与一个优秀华人女性移民的悲剧命运关联在一起，控诉“9·11事件”给人的生命带来的毁灭性戕害——包括次生性灾害。作品主人公辛蕊蕊让人爱怜、更让人惋惜。她从大陆留学美国，从墨西哥移民到美东，曾一次次化险为夷。然而，她如花绽放的灿烂生命，终究不可避免地要在“9·11事件”中黯然凋谢——没有逃脱这场人间罕见的惨烈人祸。作品没有像国际政治学家那样去追踪“9·11事件”的原因，但通过对辛蕊蕊命运的讲述，力透纸背地表达出珍重生命、敬畏生命与热爱和平的主题。小说在叙事上别出机杼，小说人物商雨量、辛蕊蕊、彼得、查理轮番充当第一人叙述人，从各自角度对辛蕊蕊的人生命运进行叙事，既构成不同叙事人之间的有效对话，也体现出对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小说叙事技巧的有效借鉴。

美国华文女作家张惠雯的《美人》，以城市普通女性何丽的婚恋生活为主线，跳出自古“红颜祸水”的书写模式，表现现实生活与传统观念对女性人生幸福的挤压，书写当代女性多舛的生存命运，让读者体会到作品人物撕裂般的人生痛楚。何丽天生丽质、心地善良，却出身贫寒，父亲是县化肥厂工人，勤劳忠厚，母亲是城郊农民，朴实善良，唯一的哥哥与她兄妹情深。小说中，父亲患上肺病后无法工作，哥哥因为从事不法经营被捕入狱，被判重罪。家庭变故使何丽不得不辍学，进鞋厂当工人。为了营救哥哥的性命，也因为美丽动人，她被迫失身于县财政局长之子李成光，却因为李父的世俗偏见无法与李成光最终成婚。她与警察孙东海的短暂爱情，伴随着孙东海的意外车祸身亡而流产，还背上“克夫”的坏名声。正当她对婚姻不再抱任何希望之时，遇到了宋远，又经历一系列爱恨情仇，最终归于平静的生活。何丽因为美貌一次次地承受生活的苦难，显示出不公与不深的无奈。

女性书写领域的新开拓，是近年来海外华文中篇小说最突出的亮点——这也表征着海外华文作家或新移民华文作家愈益升华的思想境界、胸怀与愈益自觉的文体意识。（吴道毅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吴行健系武汉市群众艺术馆馆员）



华人艺术家郝泽成油画作品《人群》